

山村“空心化”调查——2024春节返乡见闻

本报记者 程维 重庆报道

2024年春节,《中国经营报》记者在重庆农村乡下发现,因青壮年基本上全部外出打工,农村只留下年龄超过70岁的老人和还在读书的少年、儿童,“一老一少”的人力结构,导致农村出现严重的“空心化”现象,土地撂荒突出,收入缺乏支撑。

“空心化”忧虑

自己干不了,请人干又太贵,所以村里的地有不少是荒着的,根本没人种。

“近些年,除了春节时年轻人回来几天,其他时间村里基本上都只剩一些老年人和留守小孩了。”正月初四(2月13日)时,重庆市垫江县某镇某村村组长程三说,年轻人在老家待不住,全都出去打工了。

出去打工的原因很简单:该村民小组所在的区域,人均只有八分地(0.8亩),上次分地是几十年前,所以现在30岁以下的村民,自己名下基本上没有土地。按说,要等原来分到承包地的人去世后,腾出土地指标,后面没土地的人才有望排队分到土地。

“但最近二十几年来,年轻人已经不再愿意种地了。”程三说。

土地账很好算,即使人均有1亩地,不管是种水稻,还是种小麦、玉米、高粱,哪怕是换季轮种让土地一直不闲着,年收入最多也只有1200—1400元,这还没扣除人工费用和肥料钱,扣除这两样,实际年收入甚至只有三五百元。

“为什么不搞点养殖业?譬如养鸡或者养鸭、养猪?”记者问。

“农村搞养殖业,现在基本上都是散养,扣除人工和饲料钱后,养得多亏得多,所以大家都不养了。”程三说,农村散养根本没办法跟城里的规模养殖业竞争,加上现在村里平时常住人口主要是“一老一少”,仅有的一点养殖业,也主要是村民自己养来吃的鸡、鸭和猪,极个别有精力的村民会适当多养几只,出栏后会出售贴家用。

“还有没有其他副业可做?”记者问。

“没有了,现在村里‘一老一少’的人口结构,上是70岁以上,下是17岁以下,去掉80岁以上和12岁以下的人,剩下的也只能算是半个劳动力,现在连播种、收割,基本上都是在外面请人做,人力成本是每人每天给150元的工钱。”程三说。

自己干不了,请人干又太贵,所以村里的地有不少是荒着的,根本没人种。

“我看到村里靠西的‘黄土坡’上近些年‘退耕还林’满坡种的桉树2023年也全部砍掉了,这是不是‘退林还耕’?那些地现在是谁在种?”记者问。

“上面安排来集中砍的,桉树对水资源影响过大,桉树砍掉后那些地也没人去种,村里(生产大队)就请人种上了一些东西,也没人去

针对农村“空心化”,当地驻村干部和经济学者给出了一些具体建议,但也同时表示,更需要有顶层设计。

重庆市目前正在推进学习浙江省“千万工程”来解决相关问题,并推进乡村振兴。当地群众对浙江“千万工程”实践中的“农业标准地”改革颇为期待。

管理。”程三说,村民在山坡脚下自己的地都没人去种,山坡上的“公家的地”,更没有精力顾及。

“村里留守的人,有做农活经验的现在都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基本上没人能担粪去爬近200米的坡上种地了,这个年纪,自己去把坡上的粮食收割回来,也很艰难,所以就不种了。”程三说,现在外出打工基本上是村里人的唯一出路:在大城市,月收入至少3000—5000元,虽然也辛苦,一年下来总归有4万—6万元的总收入,这比窝在乡下家里务农收入要高20倍,这个账很容易算,所以年轻人全都走了,去沿海或城里打工去了。

这种情况是否具有普遍性?

重庆市某报业集团旗下放到某县的驻村“第一书记”李巡称,这不是个案,是普遍现象。目前农村的“空心化”问题很严重,土地撂荒问题也较为突出,表面上看,“18亿亩耕地红线”是守住了,但是土地没人种的现象仍很刺眼。

“现在我们村的解决办法是,请人种一些地,但这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李巡称,“大家都知道存在这个问题,但都没有解决办法。”

“即使把粮食价格翻2倍、3倍、5倍也没人种,因为一是干农活是体力活,太辛苦、太累;二是城乡收入差距达到了20倍;三是农村产出的粮食及养殖产品因过于零散,难以低成本快速卖到城里。”李巡说,何况粮食价格还不可能涨2—5倍。



重庆市垫江县某镇某村位于南北走向的铜锣山脉脚下的“黄土坡”,十几年前退耕还林,全部种上了桉树。2023年,坡上的桉树全部被砍掉,村里请人种了油菜。村民称,因为没人管理,也没人施肥,所以长势很差。

次第城镇化

2023年,重庆市“返乡创业”人员巨幅飙升。

“春节后我还会去深圳。”程三所在村民小组的村民吴成称,他在深圳打工超过25年,前些年已经做到了一个生产厂厂长的位置上,之前主要因为疫情原因,回家休息了两三年。疫情后,他再次赴深圳打工,原因在于一是已经不适应乡下的生活及节奏了;二是返乡后基本上没有任何收入,长期坐吃山空,总不是办法,所以不得不出去。

不过这一次吴成的妻子没有跟随他一起南下,她选择了“返乡创业”。

所谓创业,就是在县城开店。然而,2023年,吴成妻子开的奶茶店垮了,另开了一个韩国料理店,后来也开不下去了,休整两个月,又去开了一个“麻辣串串”店,也基本没什么生意。一年多下来,夫妻二人打工20多年积累的几十万元积蓄,基本都被“创业”消耗了。

吴成妻子的经历,也许只是个案。

如何破困局?

李勇说,农村要吸引资本,农村建设用地必须要突破,如果没有土地证,权益就得不到保护,资本和人员就不会来,因为投资权益得不到保障。

“以前春节打工回来会到农村聚会,现在基本在乡镇或者县城都有房子,打工回来就把老年人接到乡镇或者县城过年,这种现象越来越多。随着年轻人对乡愁越来越淡,怎么能苛求他们回去?”前述驻村第一书记李巡2月18日说。

这样一来,不只是平日里“空心化”,逢年过节本该聚集人气的时候,还出现了新的“空人化”现象,农村年味越来越淡。

“我写了一些日记,有一些想法,但是还没有完全系统思考这个问题。‘空心化’是不可避免的,要减少‘空心化’,其实就是解决人的问题。人怎么留下来?这是个系统问题。”李巡说,“农村人的

据重庆市人社局2023年11月3日公布的信息,2022年,该市全年促进农民工返乡入乡创业就业17.32万人,其中,返乡创业2.72万人。创建农民工返乡创业园69个,全年实现总产值371.8亿元,吸纳就业5.78万人。

2023年,重庆市“返乡创业”人员巨幅飙升。

据重庆市人社局2024年1月26日发布的消息,截至2024年1月26日,该市农民工已返乡87万人,其中市外返乡73.2万人,占市外务工农民工总数的28.3%;市内返乡13.8万人,占市内乡镇外务工农民工总数的3.6%。

该市从市外返乡人员中,从广东、浙江、福建返乡的最多。

2022年,重庆市外出务工人员约为791万人。所以当沿海用工情况发生变化时,返乡的人数便不会太少。

程三所在的村民小组,之所以留守的人群基本上只剩“一老一少”,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村里

发展,他们的未来、他们的后代怎么发展等问题,其实很复杂。”

他追问道:“如何让农村产生吸引力?喊口号是不行的。所以,如何缓解农村‘空心化’问题,经济专家也许比我更懂,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更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重庆市前沿区域经济研究院院长李勇2月19日称,目前中国的农村“空心化”问题,表面上看是“无解”的,但实际上可以通过一些点上的突破,来逐步推进面上问题得到缓解或解决。

他建议的六大解决途径分别是:一是进一步促成机关事业单位加大对口扶贫力度,并将县、乡机关干部及事业单位富余人员下

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家庭,要么在县城买房搬走了,要么在附近镇上买房搬走了。

几年前,该村民小组的东侧修建了一条一级公路,往来车辆时速可达70公里。加上此前修建的村村通公路,该村比其他山区或偏远区具有很好的交通便利优势。不过尽管如此,乡下的基础设施及配套措施,以及商业化便利程度,还是赶不上乡镇、县城,因此大家都搬到了县城、乡镇。

不知道这种“城镇化”,是否体现在相关统计中。

重庆市发改委向媒体披露的信息显示:“2022年,重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70.96%,较2012年提高14.3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50.1%,较2012年提高10.7个百分点,新型城镇化蕴藏的发展动能得到加快释放。”

当地村民称,其实这些搬到县城、乡镇去住的人,绝大部分也只是把房子买在了这些地方,人还是照样跑到沿海城市或附近大城

沉到乡村去,挖掘“一村一品”,通过他们来带动乡村振兴。二是推动能人带动,让更多的能人当村支书,因为他们了解当地的情况,也在外面开过眼界,还有资本、有能力,让他们来帮扶、带动农村致富。三是产业带动。四是靠发展特色旅游来带动乡村致富,特别是越偏僻、越荒凉的地方,独特的风景会吸引游客,就会带动经济发展。五是搞一些乡镇整合,有些自然村和乡镇人口稀少了,就要进行合并、整合,把人员集中起来,把土地集约利用起来,委托第三方进行综合诊断并做方案,整体规划,发展新农村。六是吸引主体在乡、村的示范性养老,吸引离退休人员返乡养老,人来了,钱就跟着来了。

李勇说,他所在的机构近年来为川渝多个地方做过相应方案,且多次前往浙江多地调研,目前农村发展的根本性制度问题,还在于农村用地的土地改革政策,还需要先行先试,要敢于试点,不然外来资本没法落地。譬如他目前正在做的成都青城山后山半山腰的一个方案,计划推进农村集体用地入市,腾出200—300亩农村建设用地来盘活整个项目,但是,暂时卡在用地政策无法突破上。

李勇说,农村要吸引资本,农村建设用地必须要突破,如果没有土地证,权益就得不到保护,资本和人员就不会来,因为投资权益得不到保障。原国土资源部此前已经有一个农村集体土地入市的规定,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来

市去打工,家里留下的依旧是“一老一少”,只是在县城、乡镇住的人,已经初步完成了城市化进程,他们的收入不再依赖土地,不需要再种地。

不过也有一些人,选择在老家修建房屋。这类人分成三种:第一类是在县城、乡镇购买了商品房,但仍在老家重庆修建房屋的人,这类房屋基本上全年空置,仅春节时有人回来住几天;第二类是常年在外打工的人群,赚钱后回家修房,以求年老返乡,有一个“落脚处”;第三类是村里的“首富”,将老家的房屋修成了别墅。

程三所在村民小组的邻村几个兄弟,据说前些年做房地产挣钱过亿元,在老家修建了豪华程度不亚于大城市别墅的几幢楼,这些楼外墙上还采用了全大理石干挂装饰,是附近村“最靓的仔”。

不过,这些乡村别墅跟其他农村房屋一样,绝大多数时间都空着,无人居住。

推这个事情”。

重庆市一位不愿具名的经济学者称,据他此前对浙江省“千万工程”的实地调查、了解,其实质是通过创新体制,引入各界资本下乡,全面盘活农村土地资源。

如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鲁家村就有成功经验。“公司+村+家庭农场”模式,吸引投资20亿元,一个浙江北部的贫困村,一举成为国家级标杆项目——在这一操作模式中,核心是浙江在用地政策上,推出了“农业标准地”这一政策创新。

在“农业标准地”这一政策框架下,以前严禁建房的耕地中的3%—7%的土地,可以合法建房、建厂。

2024年1月5日,重庆市召开“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暨重庆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建设巴渝和美乡村现场推进会”,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在会上提出,要“深入实施‘四千行动’,打好乡村全面振兴主动仗”。

“千万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任浙江时推进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是浙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基层农村的成功实践。

“四千行动”,是指千万亩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行动、千亿级生态特色产业培育行动、千万农民增收致富促进行动、千个巴渝和美乡村示范创建行动。

截至记者发稿,群众最为期待的“农业标准地”是否会在重庆迎来创新和突破,尚未有最新消息。受访者要求,除李勇外文中其他人名为化名

中国承诺履行“支柱二”具体进程需结合国内法规则

本报记者 杜丽娟 北京报道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国际税收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为确保跨国企业在来源地国纳税,“双支柱”方案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其中,支柱二提出全球最低税率的规定,这对跨国企业的利润分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际税收“双支柱”包含支柱一和支柱二。支柱一主要是将跨国企业集团剩余利润在全球进行重新分配,其主要解决超大型跨国企业征税权分配的问题。

支柱二是通过设立全球最低税率,确保跨国企业集团在每个辖区承担不低于一定比例的税负,从而遏制各税收管辖区为吸引跨国企业投资而竞相降低税率的“逐底竞争”。

2022年12月14日,欧盟成员国批准了欧盟最低税指令,并约定在欧盟引入最低有效税,截至2024年1月,欧盟已有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爱尔兰、卢森堡等17个成员国颁布了关于支柱二实施细节的本国立法。

随着欧盟等国家陆续制定支柱二的启航之年,对跨国企业而言,重新审视自己的全球税务布局也迫在眉睫。

2月20日,澳洲会计师公会华北区委员会会长彭飞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支柱二最核心的问题是15%最低税率的执行情况,对各国来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要求只为各国提供一个指引,最终是否遵守“双支柱”主要看各国的

实际情况。

“以瑞士为例,瑞士承诺会遵守‘双支柱’,但瑞士的要求是不对跨国企业做最低15%的要求,具体来说就是对国内超过15%部分的不具体要求,但对低于15%的则要求补缴差额部分给当地税务局。”彭飞说。

对中国而言,鉴于过去10年中国在国际税收舞台的影响力逐渐提升,彭飞表示,中国承诺会履行全球最低税率要求,但在具体执行层面,中国需要考虑国内法规则。

据悉,2021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中强调,落实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严厉打击国际逃避税,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维护我国税收利益。

次年8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多边公约〉对我国生效并对部分税收协定开始适用的公告》,该公约由OECD受G20委托牵头制订,主要是落实与税收协定相关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成果建议。

我国在该公约中采纳了两类成果建议:一是BEPS最低标准条款,包括协定应防止逃避税行为造成的不征税或少征税的序言内容,以及应对协定滥用的主要目的测试条款等;二是我国近年签署的税收协定中通常纳入的其他BEPS成果建议。

对此,一位财税人士评价称,从近年来中国在构建国际税收新秩序中做出的努力看,中国已经

在积极响应OECD的要求,截至目前,中国对支柱二的实施进度主要处于意见征求阶段,不过从官方表态看,中国支持的态度比较明确。

记者了解到,2023年10月1日,财政部官网曾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发布了《第三次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联合声明》,在第三次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环节,中德两国呼吁各国在实施被称为支柱二的全球最低税相关规则时加强协调,以避免双重征税并减轻企业的合规负担。

根据OECD的消息,目前世界上已有至少55个税收管辖区通过公众咨询、财政预算案、立法草案等形式对全球最低税的实施进行相关立法。

基于此,彭飞表示,目前部分

企业也在积极准备,其中一个内容就是证明跨国集团整体上的税率不低于15%,只有这样才能降低一个国家的税基侵蚀。

不仅如此,为保证国际税收新体系的建立,支柱二的规则也在不断完善中,这意味着各成员国需要根据自身法律框架对这些规则进行转化和实施。

在财税人士看来,未来各项规则的具体细节有可能随着各国法律和实践中有所调整。“对中国来说,目前企业所得的名义税率是25%,但在具体征管过程中,企业实际税负和名义税负并不相同,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履行支柱二的各项规定,需要结合现有政策实际情况来推进,这也是支柱二在意见征求阶段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